



康德美学及其中国化起点

蓝国桥 著

I have been a volunteer for the past few years. When the volunteers were to go and
- a CD program CD. We were going to the park to see the children. I was
I had the first time. I was the first to go to the park. I was the first to go to the park.
I had the first time. I was the first to go to the park. I was the first to go to the park.
I had the first time. I was the first to go to the park. I was the first to go to the park.
I had the first time. I was the first to go to the park. I was the first to go to the park.
I had the first time. I was the first to go to the park. I was the first to go to the park.
I had the first time. I was the first to go to the park. I was the first to go to the park.
I had the first time. I was the first to go to the park. I was the first to go to the par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德美学及其中国化起点 / 蓝国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12

ISBN 978-7-5203-5306-9

I. ①康… II. ①蓝… III. ①康德 (Kant, Immanuel 1724 - 1804) —美学思想—研究②王国维 (1877 - 1927) —美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31②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2183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刘亚楠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252 千字
定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康德美学新阐释与其中国化起点，是本书一体化推进的两个内容。

前者在于“自律—他律”两重性格的厘定，使得康德美学更显复杂而丰富。康德美学思想的生成，有其社会现实的生动来源，故而极具影响力与生命力。依存美的工具担当，以及审美最后的交流指向，均使康德美学呈现出功用性的新面相。此外，康德还坚持非本质主义审美论。

而康德美学中国化的起点是王国维。王国维在学术上倡导的化合方法论，与他内化康德学说关联紧密，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美学建构。王国维美学之西学基点与精神导师，起初是叔本华，最终却转向了康德，其美学面貌也随之改变。王国维的美学意境论，是他融合康德美学精神的重大创获。他的美学意境论与《人间词话》显现出来的“真—深”相融的双重性结构，以及其美学思想强劲的道德走向，均与他对康德美学的深度领会有关。超越而不是掠过康德，中国才能有好的美学。

目 录

导言 中西美学的分化与融合	(1)
一 分化的正当诉求	(2)
二 融合的具体路径	(5)
三 二律背反的现象	(8)
四 本书内容的安排	(9)
第一章 康德美学“自律—他律”二重性格论	(15)
一 康德美学评价的迷失与回归	(15)
二 两重性格表现的内与外合一	(19)
三 两重性格生成的人本学依据	(24)
第二章 康德美学的现实走向	(30)
一 康德思想源于社会现实	(30)
二 康德理论的合法性表现	(35)
三 向现实走去的康德美学	(41)
第三章 康德论审美功用	(43)
一 依待之美与审美的工具担当	(44)
二 审美的最后归途与美在交流	(52)
三 功用与非功用构成二律背反	(60)
第四章 康德非本质主义审美论	(62)
一 反思判断是种独断论	(62)
二 痛苦情感作为本体论	(68)
三 理性反思坚持限度论	(78)

四 审美分析采用复合论	(84)
第五章 王国维化合方法论与康德学说	(91)
一 化合方法论的前提与转化康德	(94)
二 化合方法论的提炼与康德接受	(107)
三 化合方法论的运用与康德底蕴	(116)
第六章 王国维西学基点移至康德	(129)
一 叔本华作为西学基点	(129)
二 告别叔本华的情与理	(134)
三 康德作为西学的基点	(138)
四 康德转向的重大启示	(143)
第七章 王国维意境论与康德美学中国化	(146)
一 王国维坚守言行并重原则	(147)
二 转向康德的言行并重依据	(155)
三 康德美学观念的有机融入	(161)
第八章 王国维意境论与康德本体论及天才观	(170)
一 意境“真—深”两重结构提炼	(170)
二 康德本体论融摄的局部求证	(178)
三 整体推进中的康德天才观	(185)
第九章 康德与王国维美学之道德走向	(195)
一 指责叔本华的诸理由	(197)
二 转向康德的核心思想	(201)
三 逼近康德的道德领地	(205)
四 道德立场的共同坚守	(211)
结语 康德的智慧与我们的领会	(214)
一 康德学说及其解读方式	(214)
二 批判与尊重的康德智慧	(219)
三 目的与手段的不同领会	(225)
四 康德在中国的未来展望	(231)
参考文献	(235)
后记	(240)

导言 中西美学的分化与融合

中国自晚清以来发生的最大精神事件，是西方学说的涌入。近代学术巨子王国维将西学的滔滔入侵说成是第二次的佛教入驻，足见其影响之重大深远。^①“百年中国美学”的发展，与西学的强烈“挑战”，终究密不可分。中国的知识精英面对西学的强劲挑战，需在学理与行动上真正应战。穿越众声喧嚣的理论集市，我们若细心聆听便可发现，融合与分化的两种声音回荡在“百年中国美学”集市的上空，强劲而嘹亮。

融合强调的是中西的融会贯通，它承认中西两种美学、文论存在着通约性。王国维的“学无中西说”是“融合说”的经典表述。面对“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的“西洋之思想”，王国维为有效避开中西体用的无谓争论，而严肃地指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② 中学与西学是可水乳交融且能相互激荡的，王国维的“学无中西说”为“融合说”的世纪演绎明显定下了基调。分化与融合不同，它强调中西的差异，推演到极端便是中西方的两种美学不存在通约性。中西方的文学、美学、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此为出发点提炼出的中西方美学，事实上必将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差异性。就中西美学的融合与分化分别来看，都是很有道理的，而将两者放在一起则必然会出现矛盾对立，因而中西美学的融合与分化，构成的是一种奇特的“二律背反”现象。

^①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②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融合与分化的“二律背反”，是探寻百年中西美学、文论演进激荡的最深层密码。由此，厘定中国美学、文论发展的走向，须严格依赖我们反思该种“二律背反”现象所能到达的程度。学术演化的规律表明，离开已有的理论“事实”，理论的创新发明将变得不可能。然而，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学界指点江山的“应该”叙述，从来就没有停息过。有学者坚定地认为，制造中西的二元对立是极其不明智的，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才是文论发展的正途。值得注意的是，中西二元对立的消融，在理论上的后援是西方的现象学，以及由此为基点的反思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可以说，消融对抗的努力离不开融合的观念，正如我们若以新儒家为基点，对中西美学、文论的分化观念的讨论同样也是难以避开的。

一 分化的正当诉求

中国文化、美学、文论等唯有与西方的观念相融合、贯通，才能够佐证自身的正当、合法，因此显示出其内在的谦卑性。而拨开西方的迷雾，使中国文论、美学、文化的真实面相灵动地展现出来，才是反抗谦卑的有效途径。而融合、贯通中的西方理论与中国的审美实践、材料，容易存在严重的错位。错位的出现提醒我们，奠基于审美之上的中国理论，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因而，主体性的迷失与适应性的混茫，使得中西的文化、美学、文论，分化的诉求与呼声变得日益强烈。因此，以“百年中国美学”为线索，中西方的区分与分化可在两个逻辑层面上延展开来。

层面之一是中西文化、美学各自的面貌，在区分与分化的推进中，逐渐得到相对清晰的描绘、勾勒。文化是文论、美学的母体，文论、美学是文化的结晶，因而文化与美学、文论实是血肉相连、浑然一体。面对波涛汹涌的西学，现代新儒家如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诸人，敢于逆巨浪而上，他们捍卫传统文化的决然姿态，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内敛着的传统情愫，使他们面对文化传统流露出无比的眷恋且强烈的情感，驱使他们去行动。现代新儒家是中国文化传统最坚定的阐发者、捍卫者，更是中国文化血脉最自觉的承传者、赓续者。透过他们的比较阐释，中西文化的性格容易为人所把握。他们一致指出，中国文化是心性文化，重德性、仁心；西方文化则是逐物（上帝）文化，重视知性、

外物。中国由于重“心”，文化智慧的焦点是调节人际（五伦）关系；西方因为重“物”，智慧的指向是拉近人与物（上帝）的距离。^① 耶稣基督指出，恺撒的事情恺撒管，上帝的事情上帝管，恺撒（人）与上帝（物）出现了两分，此岸与彼岸的分离具有永久性，因而西方的文化表现出明显的断裂性；而重亲缘团体（五伦）、精耕农作等的中国文化则体现出强劲连续性。^② 与此相应的，西方文化表现出对抗、对立、动荡性格，中国文化上则体现出和谐、均衡、稳定的一面。文学、审美是文化面相最生动的折射，中西文化的不同导致文学、美学上也有差异。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心性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学、美学是心性文学、美学。文化路向的不甚相同导致各类文学、审美的书写呈现出不同的情形，但心性的归属则是相通的。儒家文化使得中国文学、审美侧重于“仁心”的书写；受道家文化影响，文学、审美着重书写的是“静心”；而佛家文化使得中国文学、审美的书写侧重于“空心”。因为热衷于写“心”，中国的抒情文学格外发达。西方的文化是逐“物”的文化，因而西方的文学、美学是逐物之学。逐物需先知物是什么，知物是逐物的前提，不知对象为何物，逐物必当无效。假如缺乏理性的精神，物之知与物之逐最终还是落空。西方文学、美学逐物，重物象的变迁，因而，叙事艺术发达；而所逐之物，常蜕变为上帝，于是西方美学受宗教的影响深刻；因推崇知性，西方美学与理性精神是紧密相连的。中西的文化、美学、文学有所不同。

中西文化、文学的不同，使得中西方的美学必然呈现出差异性。知性、理性的张扬是西方的文化、文学表现出来的突出特点。西方的各种文论、美学中的模仿说、典型论、三一律、反映论等，均与知性、理性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古希腊的模仿说强调的是人与对象（物）的符合，它在西方雄霸两千余年，足以说明逐物精神在西方影响的深远性；而模仿说之后出现的各种理论，无不直接或间接地遥契、秉承着西方逐物的文化与美学精神。我们都知道，知性心意机能的基本职责是概念分析、逻辑推演。重视知性环节，带来的是西方文论、美学的浓厚的知识论色彩。受知识论惯性影响，西方出现了“诗学”“美学”“叙事学”等学科，

① 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页。

②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它们最高、最佳的形态是数理模式的推演。中国文化、文学的知性环节缺失，使它与概念的厘定、逻辑的推理距离甚远，文论、美学上也无不如此。中国文论、美学的归纳常出现的情形是，由感性即达理性，感性与理性未分。如此带来的后果是，中国语境中的“诗”“美”，绝不是知识型的“学”，可以说中国没有“诗学”“美学”，倘若有“诗学”“美学”的话，它与西方的情形必是不甚相同。中国没有“诗学”，它有的是“诗教”，它理论上强调“诗”（文学）的功能，是教化人的心性，使人“心”与“心”相通，即达到诗人所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美学的情形与此相似。中国是“诗教”“乐教”等，与西方的“诗学”“美学”各有各的不同。

中西“诗教”“乐教”与“诗学”“美学”论证的纵深推进，接踵而至的第二种情形是中西比较中的价值揭示，因而层面之二，便是中西文论、美学的价值诊断。整体上看中西文论的价值诊断，知性环节的取舍是关键所在。西方文化的演进，使得感性与理性、具体与抽象、个别与一般之间很早就已出现分化、断裂，为弥合分化、断裂的沟壑，西方人很早就已掌握概念集结、定义铺陈、逻辑推理等以知性为核心的强大武器。因有知性武器的推助，西方文论的发展，历来都很重视理论概念术语的条分缕析、逻辑推演的环环紧扣，以及文论、美学的知识谱系。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的发展中，个别与一般、具体与抽象、感性与理性未能及时出现分化，因而当中的知性机能，未能得到应有的锤打、冶炼，中国思维的习惯是理事不二、道器不分、体用圆融，理、道、体与一般、抽象、理性相关，而事、用、器则与个别、具体、感性相连，前者与后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人论“文”、说“美”喜以描述取代定义，好凭“譬喻”替代“逻辑”，因而，中国古典文论、美学重印象、评点而无条贯，三言两语随点即是，它有的是诗话、词话、小说评点，而缺乏知识性的诗学、词学、小说学、美学等诸如此类带有知识谱系性的“学”。西方知性环节的引入改变了中国长期有“文”、有“美”、有“诗”而没有“学”的尴尬局面。就此而言，西方文论的价值是在中国之上。

中国古文论、美学，伸展的维度有二：其一是“诗文评”（吴承学、彭玉平等）；其二则是“诗文行”（劳承万、王坤等）。“诗文”具体，“批评”抽象，不过“诗文评”的操练却能使“诗文”与“批评”、“具体”与“抽

象”彼此圆融统一，那是“诗性智慧”的透显。作为理论的诗文“评”，与作为作品的“诗文”，自是不离不弃。中国的古“诗文”，“具体”中通达“抽象”，“抽象”寓于“具体”中，它们是古人“诗性智慧”，飞扬灵动的呈现。同是“诗性智慧”，中国古文论与中国古诗文相比，割离的状态从未出现。“诗文”及其“批评”，指向的是人心的教化，它的最后落脚点，是通过教化人心，指导人的行动。“诗文行”的基本主旨，即是如此。若说诗文之“评”，是偏重于“言”的话，那么诗文之“行”，所强调的则是“行”。提倡言行并重，是中国古学的旨趣。因而，“诗文评”与“诗文行”两者，是可以互通你我，它们所体现出来的正是中国古学中言行并重的旨趣。理论与文学（“诗文”等）、行动三者，构成的是三位一体的动态关系，而西方理论的知性演绎，越是清晰明了，它离文学、行动越是遥远。就此来看，中国文论的价值，又是在西方之上。需要指出的情形是，中西分化的目的是想在理论上证明，中国文论、美学、文化的价值是远胜于西方，而不是做得相反，至少从新儒家的立场来看，当是如此而不如彼。

中西文论、美学的分化，满足了两种诉求，第一是中西文论、美学的殊性，在分化中得以充分展现；第二是殊性的有效彰显，进一步凸显中国文论、美学的自主性，由诉求一发展到诉求二是逻辑的必然推进。分化虽克服了融合的难度，却又使自身陷入了新的误区。分化诉求导致的误区，简而言之有二。中国古典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古人行动，是可以相互统一的，而由此它的价值是在西方之上。“百年中国美学”所面对的文学、审美、历史经验已与传统迥异，它能否不背离文学等具体经验，它能否指导现实行动，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价值论的缠绕，使得在中西美学的比较中，本该心平气和的叙述多蜕变为激进的讨伐攻讦，交流变得日益困难。将分化进行到底、执着于原教旨主义、还原出“纯粹”的中西方文论、美学——西方的归还西方，中国的归还给中国，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背道而驰。为避开分化的误区，融合同样很有必要。

二 融合的具体路径

“百年中国美学”是多种话语的叠加，其中，西方的文论、美学首先指的是马列文论、美学，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随着

中国革命的胜利，其地位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西方的文论、美学，还可指除马列文论、美学之外，出现于西方的古今文论、美学，它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纯粹意义上中国文论、美学是鸦片战争以前出现于中国的文论、美学。“百年中国美学”是上述三种文论、美学超越时空的共振。多种话语的共振使得中西文论融合的路径变得复杂起来，融合的具体路径，概而言之有三。

路径之一是理论与理论的融合。贺麟反思西学的输入时说，中国的知识精英意识到学说、观念的重要性，进而汲取西方的观念、学说是很晚近的事情，而且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血的惨痛的教训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观念、理论的变革和更新是社会变革和更新的前提。社会革新的宏大理想是中西文论、美学的融合展开的生动背景。中国古人认为，含诗歌在内的文学，既可以言志也可以言情，文学（诗歌）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因而情与志、情与礼（德）是演绎中国文论两条重要的线索。康德的批判哲学中，实践理性（意）与道德相关，而理论理性（知）则关乎知识，实践理性的地位远在理论理性之上，因而，康德眼中道德的价值高于知识。康德凸显德性，注定他的知音不在西方而在中国，王国维与牟宗三两人即是绝佳典范。意志要求绝对的自由，知识则需符合规律，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之间显然是深埋着鸿沟。康德的反思判断力批判正致力于该鸿沟的填埋、弥合，而他批判的反思判断力与情感的联系很是密切，因而“意”与“知”是在“情”的意义上很好地贯通起来，情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西方近现代的文论、美学由于受康德的深刻影响，同样强调文学中情感的功能。中国文论、美学中的“复合”定义（蒋孔阳、王一川等）与康德的审美四契机理论，绝不能说毫无关联，这需要我们仔细面对。康德与中国文论是相化合、贯通的。由此可见一斑的是，“百年中国美学”是在理论与理论的化合、融通中道成肉身。

理论与材料的贯通是融合的第二种路径。中国从古至今，积累的文学、美学材料可谓卷帙浩繁、汗牛充栋。面对西方的沉重压力，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学、美学材料是需要得到“现代性”的阐发、激活的，而阐述的“现代性”依据是历经化合、融摄的各种理论。王国维的研究表明，中国古典小说如《红楼梦》，中国的古典诗词、中国的宋元戏曲等之所以变得有价值，乃源于西方的观念，或者说是西方的理论如叔本华、康德、

尼采等与它们的碰撞、交织、融通。王国维的研究、批评的范式带有开创之功并引领着百万的后学。王国维之后，朱光潜的《诗论》，分析的材料是中国的古典诗词，而分析所选取的观念是他消融了的西方理论，如康德、克罗齐等人的美学思想。百年来的常见现象是化合、融摄了的诸理论，它们直接穿越的多是中国的文学材料。“百年中国美学”出现的基本格局便是消融的西方观念与中国材料的再结合。

路径之三是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实践包括创作与行动，因而，理论与实践融合即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理论指导创作；二是理论指向行动。西方的文论、美学观念同样有能力进入中国文学、审美创作的核心领地。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意识流、新历史主义等理论，对现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都不同程度地产生过影响。理论影响到现实的行动，明智的选择需使理论具体化、通俗化、中国化^①，历史已经证明，理论越是抽象、艰深、他者化，它进入中国现实、指导行动的力量越是受到削弱。实践的融入、行动的指导可使马列文论（美学）与西方文论（美学）、中国传统文论（美学）取得某种动态的平衡。

从理论与理论的化合，到理论与材料的贯通，再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是融合展开的三个逻辑环节；由理论再到材料，最后指向实践，是它的逻辑终点。融合逻辑的推进使它内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融合遭遇的困境集中体现在主体性的迷失、适应性的混茫两个方面。

化合的三种路径均在有意或无意中提升了西方文论、美学的价值与地位，而中国文论、美学的地位与价值，则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中。深层的原因是，在理论上、材料上、实践中迫切需要融合的是中国而非西方。“百年中国美学”竭尽全力想佐证的是中国与西方的一致，而西方却傲慢地忽略了中国，不需与中国相一致。如此情形很像鲁迅笔下的阿Q，见到贵人赵太爷，阿Q硬说自己与赵太爷是同样姓赵，赵太爷姓赵，他于是也姓赵。而高高在上的赵太爷压根就不会关心地位卑微的阿Q到底姓甚名谁。“百年中国美学”扮演的是阿Q的角色，它的身份相当模糊，它的主体性已严重迷失。

在理想的层面上，文学、审美与理论应是具有对应性，而且不分须臾。

^①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常见的情形是，由特定、具体的文学材料、实践出发，可进一步概括、推演出与之相应的理论学说、观念，而以如此之理论穿越文学、实践，也才算是有效。然而，在理论的融合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西方的而非中国的。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西方的文论、美学的生成的土壤是西方的文学、审美。柏拉图的文论、美学除了理念论影响外，与他对《荷马史诗》的烂熟于胸不无关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出现在古希腊的文艺高峰之后绝非偶然。黑格尔的美学理论与他对西方文学艺术，特别是古希腊戏剧的谙熟有着很重大的联系。西方叙事学理论的繁荣与它高度发达的叙事文学实践联系同样很密切。西方的文论、美学，与西方的文学、审美，是不可分割开来的。而一百多年来，我们却热衷于以横移的西方理论穿越中国的文学、审美，出现了错位实属难免。中国的“文学理论”多是理论的自娱自乐，少有文学的灵动呈现，理论与文学之间留下的是难以弥合的鸿沟，美学与审美也大多如此。不过，值得提醒的是，王国维的意境理论与文学、审美实践的联系倒是颇显亲密，实是个难得的例外。

理论自主性的缺失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是西方理论的大行其道。脱离西方文学场域的理论越是抽象玄妙，它与中国文学的关联越是风马牛不相及。反之，盛行的诸多理论，越是言说不了文学，越是能够证明“百年中国美学”的脆弱、自主性的迷失。如上所述，接续中国文化、美学、文论的脊梁必是提上日程的沉重事业。中西文化、文论、美学的分化即是该事业启动的信号。

三 二律背反的现象

中西文论、美学的分化，存在着远与近两种基本的动因：相对远处的动因，是现代新儒家以信仰般的虔诚高举“文化中国”的旗帜，与此相伴的是高举“文论中国”的旗帜、“美学中国”的旗帜；相对近处的动因则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倡导“中国文化”的热情输出。与此连带着的是“中国文论”“中国美学”的输出。远与近两种原因的交织，迫使中国的智识群体重新审视中西文化、文论、美学的差异。他们的审视活动表明，只有出于对差异的尊重是远远不够的，尚值得深入拷问、考量的是中西文化、文论、美学差异更深层次的机理。就此而言，中西文化、文论、

美学的分化相当的有必要且存在着相当的合理性。

中西文论、美学的融合，因有制度化的保障，其趋势强劲而有力。制度化的保障体现在文论教材的书写与意识形态建设两个方面。中国文论教材的书写，是以古今中西的融合观念作为转动的轴心。在教材融合的观念中，马克思主义思想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文论教材的编写是意识形态建设有机的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建设中，马克思主义基点的选择必使得观念的融合沿着两条路向行进。路向之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与西学、与康德等的融合；路向之二则是侧重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的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如此的两种融合是理论与现实的双重需要。中西文论、美学的融合想免遭飘扬着的旗帜的影响是相当困难的。可见中西文化、文论的融合同样是有必要的，它存在的合理性同样也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说，中西文化、文论、美学的融合是事实性的“实然”，那么，中西文化、文论的分化则是理想性的“应然”。实然代表历史、事实，应然则指向未来、理想。中西的融合与分化分开来看各自均有不足，但都是有各自存在的合理性，而若将两者放置一起，必出现某种对立，使两者构成“二律背反”现象。而“二律背反”现象是康德哲学批判最为重要的发现。康德的一个基本想法，是尽可能多吸收各方的思想营养，这足以表明康德与很多伟大的作家、思想家一样，已经拥有了弥足珍贵的“中道智慧”。^① 笔者写作该书，是以康德的“二律背反”发现，或者说是以“中道智慧”作为出发点，凭借的恰是融合的观念。如果从王国维以叔本华的学说评论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算起，“百年中国美学”的历史苍茫，中西方融合的观念始终是如影随形。可以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分化有弊也有利，融合无不如此。

四 本书内容的安排

本书的基本内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康德美学的新反思；二是王国维对康德的接受。第一方面的内容是在间接上对后者的宏观渗透；而第二

^① 刘再复：《读书十日谈》，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0—44页。

方面的内容则是对前者的整体呼应，前后两者有一种彼此照应、呼应的作用。王国维对康德的接受处于起点的显赫位置，其学术史价值不容轻视，即中国接受康德是从王国维（梁启超）这里拉开序幕的。考虑到两个方面内容的相互照应，以及王国维破天荒地接受康德的重大学术史价值，故本书名为“康德美学及其中国化起点”。

本书对康德美学的反思富有新意，主要基于两个方面原因的考虑：第一是对康德美学思想复杂性与丰富性的充分体认与辩护；第二是充分尊重并吸收康德哲学美学的“二律背反”思想。前者警示我们，需拥有一种更高远、更理性的视野对康德美学加以剖析，且不拘泥于原有的思想观念；后者则要求我们敢于“回到康德本身”，用康德的眼光审视康德。本书对康德美学的审视，以这两个方面作为出发点，将得出与过去陈陈相因的观念不太一样的结论。而不同之处主要体现有二：第一是在“自律—无功利”之外发现了另一与其相对的维度存在的可能，这样就为康德与中国传统美学的对接寻找了沟通的桥梁，也为王国维的接受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思想背景；第二则是在“理性—本质主义”之外，同样也发现了与其相对的思想维度，如此也能发现康德美学的当代价值，同时与王国维所理解的意境有着若干的亲和性。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康德美学的认识都停留于自律性层面，即认为康德是审美无功利原则的坚定捍卫者。如此认识的固化与僵化使得康德成为各种新潮美学批判的靶子，康德美学也遭受深刻质疑。如果我们不无偏见地来看的话，康德美学除了自律性之外还存在着他律性维度。因而从整体上来说，康德美学的性格应是具有“自律—他律”两重性。康德美学这种性格，除了是阿多诺的独到发现之外，我们还可从康德的实际出发去寻找它生成的理路。具体说来，康德美学越是自律，越是能完成它的过渡功能；而在优美与崇高、纯粹美与依存美两者之间，后者的价值都在前者之上。之所以生成两重性格，是与康德对人两重性的体认密切相关。

拥有两重性眼光，使我们对康德美学的把握站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由于将他律维度凸显出来，我们终将看到，康德哲学美学有其生成的现实来源，同时也能经受得住现实的拷问。康德的美学思想与他的现实生活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康德的美学思想源于他对艺术、审美、生活现实的体验

反思。康德美学中的人与审美，在历史的变化中所构成的是同生、共在的协调关系。美在直观、痛苦对审美的作用更大、美虽无用却有大用、美的理想是人的身体……诸如此类的观念都足以表明，康德美学的现实走向确实存在。而康德的先验审美，以现实交流的有效性为归依。在康德美学思想的最深处我们能找到通往马克思学说的隐秘道路，由此我们才能够理解，马克思是德国古典哲学美学合法的继承人。康德美学同样在向现实开放，否则，它将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他律性格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康德美学还与功用相牵连。很少有人愿意提及康德审美的功用性，事实上审美的功用性是康德美学内部的原有话题，它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康德眼中的审美，可趋向于目的、意图。审美在目的性的使用中，逐渐蜕变为手段、工具，即康德所说的依存美（依待美）。依存美展现的路径简而言之有二：路径之一，是对象作为美的整体与预设的目的概念相牵连；路径之二，是对象作为美的部件被有目的地使用着，并参与到目的的实现过程当中。依存美因充当着工具而具有功用性。其二则是康德美学中，审美的最后趋向是社会性的交流。康德的反思判断，一方面就审美的对象与主体看，表现出对差异性的高度尊重；另一方面就审美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看，体现出对共通性的极度向往，因而能促进交流的有效展开。若离开社会交流，审美将失去它的魅力。审美因为作为交流的媒介而具有功用性，功用性很好地诠释了康德美学他律性格事实上的确存在。

康德属于大陆唯理论哲学阵营，中外学界一般的看法是，康德虽严厉地批判了“本体论”，但他仍对形而上学眷念不已，因而在反本质主义兴起的时代浪潮中，康德很容易作为“本质主义”被“反”掉，至少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康德仍是作为潜在的强劲的理论对手而存在。一个较为恰当的办法是，需重新审定康德的美学，还给它非本质主义的应有面相。康德非本质主义审美论，肯定审美的普遍“本质”，而不承认僵化的“主义”，它介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康德审美论的非本质主义性格，整体上可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鉴赏判断在康德那里属于独断论，它以非对象性与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能在审美艺术与科学、道德之间，划开坚硬的逻辑界限；二则是康德赋予痛苦以本体论的地位，深刻地影响着叔本华、王国维等中西学人的理论建构；三是理性在康德那里存在着明显